

基于权力范式的 经济学理论研究

张屹山/等著

Theoretical Studies on
Economics Based on Power Paradigm



方志出版社

基于权力范式的经济学 理论研究

**Theoretical Studies on Economics
Based on Power Paradigm**

张屹山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于权力范式的经济学理论研究 = Theoretical Studies on
Economics Based on Power Paradigm: 英文/张屹山等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80238-751-5

I. 基… II. 张… III. 经济学-研究-英文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3303 号

基于权力范式的经济学理论研究

著 者: 张屹山等

责任编辑: 周 全

出 版 者: 方 志 出 版 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 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3. 5

字 数: 396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238-751-5/F · 44

定价: 5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本书得到吉林大学精品项目基于权力的经济学
分析新范式研究（2004JP008）的资助

目 录

概 论 篇

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导论	张屹山	王广亮	(3)
真实的经济过程：利益竞争与权力博弈			
——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	张屹山	金成晓	(18)
经济权力结构与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张屹山	于维生	(35)

企 业 篇

权力、控制权与企业契约	王广亮	张屹山	(49)
企业控制权最优分配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金成晓	胡 鑫	邵 鲁 (63)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企业剩余分配的			
权力解释	张屹山	董直庆	王林辉 (74)
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博弈分析		于维生	(86)
资本的泛化与权力博弈	张屹山	王广亮	(97)
企业剩余分配和经济权力的动态均衡			
过程	董直庆	张屹山	李富强 王林辉 (109)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规则	王广亮	张屹山	(121)

市 场 篇

基于权力范式的价格理论	张屹山	刘玉红	(135)
-------------------	-----	-----	-------

股价和我国股市发展的权力演绎	董直庆 王林辉 (157)
经济权力和股权定价模型	张屹山 董直庆 王林辉 (168)
具有责权扭曲的银企信贷博弈	于维生 (180)

政 府 篇

权力视角下经济主体博弈理论研究	张屹山 刘海英 (195)
权力配置、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	金成晓 袁 宁 徐卓顺 (211)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赋予 农民平等权力	张屹山 齐红倩 卢长洪 (223)
振兴东北经济关键在让权、放权、授权	辛本禄 张屹山 (232)
进场费的政府规制效果分析 ——基于权力范式的零供 关系研究	杜玉申 张屹山 刘玉红 (243)

附 录

Introduction to the Power Paradigm of Economic Studies	Zhang Yishan, Wang Guangliang (265)
The Real Economic Process: Interest Competition and Power Games	Zhang Yishan, Jin Chengxiao (288)
Symmetry betwee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Zhang Yishan, Yu Weisheng (313)
Economic Power, Right of Control and Firm Contracts	Zhang Yishan, Wang Guangliang (328)
Studies on Games among Economic Agents: A Power Perspective	Liu Haiying, Zhang Yishan (346)

概 论 篇



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导论

张屹山 王广亮

摘 要：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益通过分配机制来获得。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优化，在同一层级内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要求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经济主体权力与责任的对称，是达到这一目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权力范式 利益分配 权力博弈 经济权力 行政权力

一 引 言

权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加尔布雷斯甚至认为，不考虑经济权力作用的经济学，是毫无意义和不切实际的，现代人的经济行为不仅是一种财富的追求，它同时也是一种权力的追求，忽视了社会制度结构问题的经济学根本不可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Galbraith, 1983）。加尔布雷斯按照权力运作手段的不同把权力分为应得权力、补偿权力和调控权力，与此相对应的^①

^① 某一种行使权力的手段和某一种权力来源之间存在着某种基本的关联，但不是排他的。比如组织对外可以使用调控权力，对内则可以使用应得权力。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则可以综合使用所有三种权力。运作权力的手段和行使权力的来源是相互交错的。

三种权力来源是人格、财产和组织。在现代工业社会，组织和调控是最主要的权力来源和手段。他还认为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者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生产资料所有权。在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斯和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接近：在马克思看来，从来没有纯粹的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资源配置只能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进行，这种权力的基础可以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他们的另一点相同之处就是都采用了矛盾分析法而不是均衡分析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加尔布雷斯则认为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权力不平等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

加尔布雷斯和马克思都是基于阶级对权力进行分析，这是他们不容于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原因之一。权力概念在经济学中的研究也被限制在极狭窄和特殊的范围内，权力的含义和其广泛的重要性几乎没有得到认识，这一状况直到最近才有了根本改变（Palermo, 2000;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 2001; Young, 2000）。Acemoglu^①和Robinson认为经济制度是受到其他因素比如政治力量的制约的，而且勾勒出了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完整的框架。在他们的框架中，不同集团的权力是制度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中权力的来源包括形式上的政治权力和事实上的政治权力，前者是政治制度所赋予的，后者则是经济资源分配所导致的影响政治决策的力量，本质上就是经济权力。本期形式上的政治权力和事实上的经济权力决定了下一期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又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和下一期的资源分配。这一理论明确地指出了权力在经济制度变迁中所占有的核心地位，正是权力的分配决定了经济制度、资源分配和经济的增长率。任不寐（2003）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了权力经济学的概念。他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关于私有经济制度和市场竞争的经济学，中国的产权单一制或者说王权所有制破坏了西方经济学生存的基础，西方经济学无力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而权力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能会有助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他希望在产权单一制的前提下建立与西方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制度的经济学说，但是他的论述还只是关于权力的经济学解释而不是经济学的权力学说。本文试图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旧

^① Acemoglu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他在不同领域都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尤其是在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工作很有创新性，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因此于 2005 年获得了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

制度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给出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无论是市场竞争还是交易费用，这些概念都不能准确地把握这种关系。权力概念则不然，权力关系是相互的，权力的行使和实现依赖于权力对象的选择。契约、产权和制度的概念虽然能够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这些概念假定先验存在超理性或者强制体系，从而削弱了其解释能力，特别是不能说明其自身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变迁的。本文提出的权力范式是把权力概念作为主要研究单位，并分别在市场、企业和政府三个权力博弈场中对权力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制度、机制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

二 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最精华的内容可以这样归结：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机制形成了价格，价格的波动在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传递了某种信号，从而调节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商品价格由市场确定，工资由市场确定，利息和地租也由市场确定，整个经济过程没有权力存在的空间，一切权力都屈从于非人格化的市场作用，一切决策都是对市场指令的反应。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说遇到中国问题总是捉襟见肘。不仅如此，它的分析范式——把中国政府视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政府——不仅掩盖了中国政府作为最大的企业组织这一基本真相，而且无法给出真正的改革建议。这是因为，关于这个巨型权力企业的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都没有把分析指标固定在权力上。本来，不少保守主义学者期待，权力的货币化最终会实现利润平均化，演进出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但是，由于这个市场的周期性危机或权力的周期性更替，以及政治机会成本极低等造成的权力市场排挤资本主义市场的成长，使得这个乐观主义的前景越来越渺茫。

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在于过分理想化的假设，其结论也是理想化的。凯恩斯之后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虽然容纳了社会经济现实，但是在这一框架中，市场出清和失业的矛盾不可调和。宏观经济学只注重总需求水平的调节，而微观经济学只关心成本和价格的形成，两者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导致宏观

经济缺乏个体理性选择基础，而微观经济缺乏对宏观现实的解释力。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学过于强调经济理论的形式化。从李嘉图的抽象演绎到马歇尔的经济模型化，经济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同时，也埋下了经济学形式化的“祸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在把社会现象中的纯经济因素抽象成模型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转换成以经济主体面对市场环境的理性选择为基础的人与物甚至物与物的关系。经济主体被彻底物化了，不仅劳动没有差异而且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经济学失去了活力变成了黑板经济学。

经济学形式化产生的另外一个恶果就是经济研究完全脱离了政治。自从凯恩斯以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新古典学派认为市场机制会使得资源配置自动达到最优，由于政府并不比市场知道得更多，所以政府的干预只会给经济系统带来无谓的损失。反对者则认为，市场机制不会使经济达到最优，即使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它的调整也是漫长而痛苦的。其实，经济和政治一开始并不是分离的，经济学是从政治学中孕育出来的。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以经济学的研究结论为依据制定国家的相关政策，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旧制度经济学的逻辑顺序。相比较而言，经济学以成本和收益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政治经济学则不仅研究资源配置的全过程，而且也研究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权力性因素。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说，试图把经济和政治及其政治意图分离开来，完全是无意义的，它遮掩了经济势力及其意图，也是经济决策失误和错误判断的主要原因（加尔布雷斯，1992）。脱离了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纯经济学理论势必忽略了政治意图对经济的影响，而这种忽略通常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离开社会政治体系的所谓经济过程，也不存在离开追寻利益的纯粹政治过程。不过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并不简单的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经济和政治是杂糅在一起的，经济理论可以为政治提供决策服务，但决不仅仅是为了政治和设计新的经济政策服务。政府的经济政策本身也是经济行为，尤其是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一定总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出现。自由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2005）不相信政治和经济可以分开，他认为并不是任何政治安排都可以与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跳出了市场机制本身，认为市场交易存在交易费用，因而存在别的组织形式（如企业）完成交易，从而实现了

从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转变。转变的起点是科斯试图打开企业这个黑箱，把企业提到了和市场一样的高度来研究，而不只是把企业作为市场中产品供给的一方或者生产要素需求的一方。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回答企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因为科斯以后的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企业本质以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关键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阿尔钦、德姆塞茨还有后来的张五常认为市场是比企业更普遍的机制，企业不过是市场契约的复杂集合。生产技术的原因可能会要求团队生产方式，但在这一生产过程中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可以解决不同要素的监督 and 定价问题。与他们的理论不同，威廉姆森把科层制的工作关系作为企业区别于市场的主要特征，雇佣关系明显不同于市场上平等的交易关系。科层制通过权威关系削弱了机会主义，或者说由于市场高昂的交易成本，企业机制可以替代市场机制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之后，格鲁斯曼和哈特在威廉姆森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控制权从而模型化了这一理论。以上这两种理论看起来很不相同，但实际上他们不仅相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且似乎搭配的很完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当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之后，经营者不仅拥有了剩余控制权而且具有私人信息，所以委托人必须选择或设计最优的合同来克服代理问题。选择或设计合约的原则就是对于企业权力的安排要尽可能地把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统一起来。然而事实不尽如人意，在现代企业中，剩余控制权归属于经营者或说是人力资本，而剩余索取权既包括了生产要素的贡献，更包括了风险。人力资本得到剩余控制权，但不能完全承担风险，当经营损失威胁到企业时，尽管人力资本也承担了失去未来收入的风险，但只有物质资本才能弥补这种损失。企业剩余不能自然地分成两类，即物质资本承担风险的剩余和对应剩余控制权的剩余，可以说，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现代企业中永远不可能统一在某一种生产要素上。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概念本身，通过传统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比较发展出来的概念虽然能够解释企业制度的演变，但不能解决现代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已经开始关注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合作以及事后的分配过程，但却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等）间接地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制度成为研究的对象而内生化的时候，更基础的制度体系又必须被设定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给定经济主体的选择约束集。诺斯的次级性制度变迁就是依赖于制度环境，而把基础性制度变迁归因于思想意

识形态以及道德。新制度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模式把制度推向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它不能追本溯源地解释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以囚徒困境为例，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帕累托最优的矛盾在于博弈方对利益的生产合作与利益分配的不一致。当假定囚徒困境问题处于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以及能够进行事后惩罚的市场中时，人与人之间的主动合作就不是必须的，每个经济主体所面对的都是既定经济结构下的个人优化选择。即使没有产权的界定，个人的最优选择也必然会导致社会帕累托最优结果的出现。当放松完全市场的假设，考虑到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等因素时，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以及合作收益的分配就出现了冲突，高昂的交易费用使得市场失效了。如果能够对产权进行界定，就可以给出博弈方策略的选择范围以及对对方的预期，从而有助于对冲突的解决。但问题是产权的界定一方面会影响到最终的合作收益大小，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利益分配的结果，因此如何界定产权本身要比解决资源配置问题重要的多。也就是说，如果把制度看作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手段，选择更有利的制度从而获取制度利益就要比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讨价还价更吸引人。新制度经济学只是意识到了制度及其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仍没有很好的回答制度是如何起源和变迁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在制度存在和变迁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权力，这是比制度更本质的概念。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源于权力结构的变迁，只有重新认识到权力在社会事务中的重要性，才能正确解释历史（罗素，1991）。以中国为例，近百年的经济变迁和发展的背后，无不体现着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结构变化与博弈。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权力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认为，阻碍清朝末年中国从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是落后的科学技术和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事实上更深刻的原因是清朝皇权的垄断。政治上，清朝废除了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制度，扼杀了地方和人民的创造性。经济上，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甚至连盐、铁、火柴等生产性活动都被政府垄断，基本不存在自由企业。清朝洋务运动的实质也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这种集权式封建官僚体制也阻滞了工商业资本家的出现。由于官僚控制着社会各个方面，使私人活动几乎没有法律空间，任何经济活动都屈服于皇权和官僚的控制和压力。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当国家权力被用来追求特权阶级利益而损害社会

公众利益时，清末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停滞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则基本处于武力和洋权交替控制之中。一方面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以及社会动乱频繁发生，另一方面各种外国租界和特权不断渗透。在城市，工业不仅少和落后，而且大都被四大家族和洋资本所把持。因此，不仅工人阶级受到洋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奴役，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处于受排挤、寄人篱下的地位。在农村，占人口总数不到 10% 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 90% 以上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并利用借此而形成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再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和侵害，使得农民长期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广大民众在连生存权都无法保证的时候，通过造反武装夺取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均分土地便成为唯一出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通过强大的政治权力，无偿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在自然资源紧张的条件下，使中国大部分农民获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权力失衡的问题，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大发展。城市工业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新政府没收了洋资本和买办资本，解放了民族资本，使各个经济主体都有较为平等的经济权力，极大地调动了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工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1954 年前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 年的大跃进和 1960 年的人民公社化把土地等生产资料全部归公，导致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从而形成高度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使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这种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扭曲形成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最后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为标志而达到顶峰，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1978 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和分解的一个复杂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全面重新界定各种权力边界和培育市场主体的过程。它通过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不断归还个人和企业的权力，来实现微观主体的经济激励。一方面，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是经济权力由易到难的界定过程，其结构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界定产品的使用权、收益权和界定劳动力和土地的使用权，这使生产和交易效率大大提高，表现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营企业承包制及个体工商户的兴起；

第二阶段为界定产品和劳动的转让权以及劳动的收益权,表现为国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同时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出现并开始发展;第三阶段,界定金融财产权和土地转让权,主要表现为股票市场的建立和沿海房地产业的兴起;第四阶段是所有权的界定,个人和企业产权得到承认,尤其是在《宪法》中私人财产得到承认,使产权配置更符合市场化的要求,表现在国有产权的范围和比重在缩小,民营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行政分权。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对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行政分权,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后是14个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浦东开发,以及后来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每一轮的放权都激励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也为下一轮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推动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改革中权力的下放过于缓慢,广大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农村土地使用权在70年代末分给了农民,1984年起又允许土地使用权的部分转让,这种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但从1985年以后,刚起步的权力下放与权力均衡的进程就基本停滞了,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城市和工业改革上,使才有起色的农村又变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农村权力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土地所有权的缺失。自从人民公社化后,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甚至连使用权也难以保证,政府随时可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名征用土地。没有长期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就不会有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也不会有农业的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第二,受教育权的缺失。农民不仅难以得到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也得不到充分保证。不接受良好的教育,怎么能够有良好的就业机会,怎么能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又怎么能够摆脱长期的贫困呢?第三,社会保障权的缺失。由于政策的原因,农民受到各种歧视,如最低工资、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困难补助等惠民政策无一能降临在农民身上,甚至连改革开放前实施的合作医疗、免费教育都享受不到了。第四,自由迁徙权的缺失。同是普通公民,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农民不能平等地进入城市工作、学习和生活,当然就更不能平等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发展的机遇。第五,话语权的缺失。农民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最弱势的群体,由于他们居住分散、缺乏组织、缺少知识,很少知道维权,更少知道怎样维权。可以说,权力的缺失是中国“三农”问

题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赋予农民平等的权力。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我们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所谓权力，泛指凭借所掌握的资源而形成的对他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所谓范式，则是指在一定假设和前提之下，按照一定的逻辑思维方式分析某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就是从权力的角度对经济学的重新诠释，并试图给出一个完整的研究经济现实的框架，它是在对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其他非主流学派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既是延续也是发展。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可以深刻地揭示决定经济活动的本质因素到底是什么，还可以自然地解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断裂以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

三 问题的探索

人类的经济活动虽然主要表现为物质运动，即物质的生产、物质的分配、物质的交换、物质的消费等等，但这种活动不是春花秋实，斗转星移的自然的物质运动，而是一种人为的物质运动。这种运动具有群体性，纯个人的运动，即使是生产活动，也只是一种生存运动，而非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对个人来说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来说则是追求价值最大化，而对于政府来说，利益最大化则是指社会福利最大化。在每一个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经济活动的群体性和社会性就会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这一分配不仅包括生产的分工合作和合作收益的分配，而且还包括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在经济活动的四大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分配是最为关键的，它不仅决定了交换和消费，而且还决定着生产。对于企业来说分配是否合理，既影响各种要素的投入量，又影响各种要素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利益分配的合理化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分配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是如此之重要，它不仅决定了相关活动能否进行，而且还影响着该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在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结构依赖于权力结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分配体制和分配方式的形成。

首先看企业，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企业是一系列契约所构成的经济组织。而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协作生产、共同受益的交易方式，所以企业的